汉字与中日语言文化交流

刘海燕*

一、汉字在日本的传播和教学

1. 汉字经由朝鲜传播到日本

据史料汉朝对日本赐以印绶，刻有“汉倭奴国王”的金质印绶于1784年在日本出土。以许慎《说文解字》成书时间推断，当时的汉字已然成为完备的文字体系。日本《日本历史大辞典》等相关记载，约公元285年，汉字经由朝鲜传入日本。继中国的铁器传入日本促动日本农业发展之后，汉语的四书五经、《千字文》的学习推动日本文化的全面发展。

一般来说，文字是记录语言的工具，但是“某种语言一旦拥有了文字，文字就会对语言发展产生反作用”，学者们已经看到了这种可能性（周健，2010）①，“特别是像汉字这样的语素文字，对汉语的反作用尤其明显突出”。日本学者白川静（1910-2006）也一直强调，日本根据汉字改制的注音文字是假名，汉字作为记录概念和表达思维成果的符号则被看作“真名”。人群之间有往来，就有语言文字接触，陆锡兴（2002）说“汉字是独立发展起来的一种意文字，它在商代就开始从中原向外传播，向四方发展”②，传播就是一种对外教学和推广。罗卫东（2001）③说：“汉字最初传入朝鲜半岛时，由于当时汉文化作为一种优秀文化为东亚地区周边民族所仰慕，所以在吸收各方面的汉文化时，对承载汉文化的工具——汉字全面接收。”汉字较之“汉语”走得更远。我们无法截然分开地说汉字教学和汉语教学，只能说各语言之间的渊源关系和类型有差异，汉字习得与汉语习得的关系跟西方语言文字学习的过程很不一样，呈现出“文化载体”和

＊ 刘海燕，中国传媒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① 周健，〈分析字词关系，改进字词教学〉，《语言文字应用》(2010年1期)。

② 陆锡兴，《汉字传播史》（语文出版社2002年）。

③ 罗卫东，《汉字在韩国、日本的传播历史及教育概况》，《中央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3期）。

“纯粹交际工具”的不同，呈现出习得年龄、习得顺序、习得步骤、习得方法的独特性。

2. 日本全盘接受汉字及其文化

日本圣德太子是史上一位成功的汉语学习者，631年他第一次派出遣隋使。此后遣隋使遣唐使到中国进行“沉浸式”学习，把中国语言文化带回日本。吕叔湘（1987）④说“汉语的书面形式是汉字，汉字可以离开口语而存在，这就促成了书面语和口语的分离”。中国大陆各个方言区的人们学习汉字书面语时会绕开语音，采用“目治”的方法由文知义。唐代之后的《切韵》通过“科举取士”普及，形成了文读的“字音”类别，使古今南北的字音差异保持对应。遣唐使的汉字学习也采用“目治”“笔谈”手段，生吞活剥地记住汉字，通过整理韵书，借助“训读”体会理解汉文古籍，经过“内省式”的学习，加上学员之间的讨论，最终达到汉文写作——汉语书面语表达的水平。

公元十世纪日本片假名和平假名已经成熟，中日交流渐渐放缓。日语中至今保留汉字原形原义，有的在现代汉语中反而已不多见，例如表示颜色的的“赤（红色）”“青（蓝色）”等。立秋在中国（北方）是凉风渐起的时候，但是日本仍是天气炎热的日子，即使如此，日本仍然原封不动地保留汉语用词习惯。汉字字形和意义变化较小，字音变化大，日本借用汉字时相当忠实地保留不同时期汉字读音，例如汉字“子”在唐代近似日语的“し（xi）”，在宋代近似日语的“す（su）”，近代近似日语的“さ（sa）”，根据日语中汉字的读法，可以推测各个物品分别是什么时候传到日本的，“帽子（し）”是在唐代，“椅子”（す）是宋代，“饺子”（さ）是近代。

通过学习汉字进而掌握汉语，与学习汉语必须掌握汉字，是无法割裂相辅相成的。但是用母语的思维还是用目的语的思维来掌握外语？显然，用母语思维会肢解目的语及其文化，容易造成外语学习中的石化现象。日本全盘接受中国文化，即日本人的汉语（二语）习得采取中国传统语文教学方式，将汉字文化融入自身的思想、语言表述和行为模式之中，是一种超完整意义的外语习得。

3. 汉字对日语发展演变产生影响

汉日接触过程中，日语发生了适应汉字的演变。受到外来影响的变异是为“他变”，内在趋同的消化性的变异是为“自变”，先看他变。汉日语言接触

④ 吕叔湘，《吕叔湘论语文教学》，（山东教育出版社，1987年）。

造成了日语增加异读、产生借词、形成语缀等，例如汉字“一”，训读为“ひと”“ひとつ”等，汉字输入造成日语的混杂叠加，一字多音，一词多形，同义表达形式多样。学日语的中国人最初觉得日语容易，但是要做到在不同场景、面向不同对象实现口语、雅言、洋话多种语码即时转换，必须是生活多年才能做到。

再看自变，日语混杂成分的淘汰和取舍有汉字汉语影响。实际上不管是越南“喃字”创制者，还是朝鲜文字创制者世宗大王，这些整理自己民族语言的知识精英，都是自幼熟读四书五经的优秀汉学家，汉语知识积累影响着他们对本族语的观察认识，汉语思维主导着本族语的修订方向，可以说汉字汉语对日语的影响也是基础性的、系统性的。

语音方面，日语一个假名是一个元音或一个辅音加元音的音拍，由此被称为音拍语（音拍语mora）。平假名诞生之后，日本各地方言的拨音、长短音、拗音、促音、浊化音等趋向于简化，语音系统总体来说趋向于元音清晰化，音拍明朗化，与汉字音节（音节语syllable）形成比较整齐的对应。

词汇方面，日语词汇有本土词、汉字词和外来词，还有少量其他语言的借词。本土词在口语中使用多，汉字词则在书面语中有60%之多，汉字词输入影响了日语构词方式，例如日语动词后置，“海拔”就是“宾动式”日式构词，受到汉语影响，日语词汇中也出现“退院”“送電”等“动宾式”词语。

语法方面，日本训读汉文，例如用“国破れて山河在り，城春して草木深し”训读汉诗，汉字词作为“词根”“核心语素”表示概念意义，平假名作为附属词标示语法关系，形成规整的句子结构。例如：明日 東京から 大阪へ 新幹线て 出発する。意思是：明天（时间）从东京（起点）到大阪（目的）乘坐新干线（方式）前往（动词）。

韵律是语音、词汇、语法、修辞的综合考量。日语的韵律很多是考虑5音拍、7音拍，尤其是书面语形式的诗歌、谚语、俳句、短歌等，现代生活中的广告语、标语等也注意使用5音拍、7音拍，容易诵读和理解。汉语的韵律也讲究五言和七言，似乎两种语言韵律感也“不谋而合”。

4. 汉字始终留存在日语书面语

日本、越南、朝鲜等国虽然在不同时期创制了自己的文字，但是汉字书面语都曾经长期作为记录历史的官方文本，都需要学习汉字以便研读历史文献，现在使用汉字的商家牌匾、书刊题名等仍然是随处可见的语言景观。研究现代文学的

学者刘进才⑤注意到："在欧洲各民族语言发展的现代谱系中，各个现代民族国家语言的诞生是以挣脱古老的神圣语言——拉丁文、希腊文或希伯来文逐渐向地域方言靠拢，通过现代印刷语言从而建立起各方言区域的书面语言。" "言文一致"早在文艺复兴之后就已经在欧洲各国逐步实现了，所谓印刷语言，即书面语，是民族语言独立的标志，在"汉字地盘"上，日本等东亚国家"印刷语言"中，一直或多或少留存着汉字的身影。

研究近代日本言文一致问题的学者齐一民注意到，在西方文明冲击下，越南韩国日本等都经历了"去汉文"的过程，希望将本民族语言从地域性的俗语方言改变为国语，达成语言的近代化"质变"⑥。但结果是，日本在多语种、多文化之间灵活转化的特征增强，"废除汉字"的潮流则始终未能达成正果。瑞典人高本汉指出："把日本文字统一改为拼音文字，势必过激，引起反感，终或无从实现，何况又非必要呢，那简单的平假名系统，对于日语的音读的组织，非常适合"⑦。

二、日本对汉字传播和教学的贡献

中日两国政治制度、选拔人才方式、教育文化体制、经济发展轨迹存在很大不同，分析日本汉语教学国别化特征十分必要。

1．实用主义的汉字教学

中日两国文化继承心态不同，可以说日本选择了实用主义，实用主义选择了日本。本文不讨论实用主义之利弊，只是从这个角度观察历史上汉字教学在日本的国别化特征。

（1）用假名注音

早期日本皇室的汉语教学有"教养汉语"的意味，表面看来交际功能并不突出。实际上那时的政治文化精英死记硬背地学习汉语，尤其是遣唐使，是冲破性命攸关的旅途到达中国，其内在驱动力是掌握儒家思想、求取治国方略，是"政治汉语"学习的需求。对待孔孟儒学，以及后来传入的禅宗学说，宋代以后传入的朱子理学，日本不是从哲学体系正统性上去把握，而是将它作为阐述意识形态

⑤ 刘进才，《语言运动与中国现代文学》（中华书局，2007年）。

⑥ 齐一民，《日本近代言文一致问题初探》（北京大学博士论文，2013年）。

⑦ 高本汉，《中国语言学研究》，贺昌群译（商务印书馆1934年），第163页。

的工具。王玉强《朱子学的日本化与兰学的兴起》⑧说“日本兰学兴起之前日本的儒学环境是积极的、灵活的和宽容的，日本‘落地化’的朱子学对自然和人认识的变迁使兰学在日本能够兴起和获得更大规模发展成为可能”。也就是说，日本的“朱子学”能以积极、灵活和宽容的心态接纳西方文明，总是能将“有用”的部分剥离出来加以技术化的处理。日本学者源了圆《日本文化与日本人性格的形成》⑨说，“日本文化不喜好思辨形而上学的东西,而具有偏重现实现象、经验、实证方面的‘客观主义’的倾向”，可以称为日本人的“即物主义性格”。

“古典时期”日本对汉字的传播主要贡献是用“假名”标注汉字。片假名取自汉字笔画的一部分创制，平假名则来自汉字的草体，这是了不起的创造。中国在民国初年才开始研制“注音符号”，是在一千多年以后了。

（2）明确常用汉字数量

中日两国文化教育发展轨迹不同。中国古代语文教学多为科举考试服务。日本学者衣田熹家《中日两国现代化比较研究》⑩看到，中国是“选拔、到达目的型”的教育，日本是“普及、提高能力型”的教育。《日本近代教育百年史》⑪资料显示，幕府末期，日本全国已有一万五千余所寺子屋，这种日式私塾非常普及和平民化：入学普及率在一般农村达20%，较发达农村近40%，较好地区男童入学率近100%，女童60%。寺子屋教育在近代平稳转型为小学教育。杨娟（2009）⑫对寺子屋教育内容、教育方法考察后指出，近代中日两国工业化、现代化经济发展的节奏不同，国家的教育投入及其方式不同，小学教育差距加大。

中国科举制度下，汉字“出生不报户口、死了户口不注销”，一个茴香豆的“茴”有四种写法。日本寺子屋的孩子们学习日常生活所需识字、写作、计算，急用先学。“国语”教学配合“尺牍”“往来物”（即书信）学习汉字，精简汉字字数首当其冲，《千字文》被选为适用教材。因为《千字文》凸显汉字系统全局意识和频次意识，能作为四书五经的检索版本。

1981年日本规定了1945个“当用汉字”，后来又进行修订，增加到2000个，

---

⑧ 王玉强，《朱子学的日本化与兰学的兴起》，《东北亚论坛》（2007年第2期）。

⑨ 源了圆，《日本文化与日本人性格的形成》（北京：北京出版社，1992年）。

⑩ 衣田熹家，《中日两国现代化比较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

⑪ 日本国立教育研究所编，《日本近代教育百年史》，文唱堂1974年。

⑫ 杨娟，〈私塾与寺子屋一管窥中日传统教育资源之命运〉，中国地方教育史志研究会、《教育史研究》编辑部主办。《中国北京《教育史研究》创刊二十周年暨中国教育史研究六十年学术研讨会论文集（21）——中外教育史比较研究（含比较教育等）》(2009年9月)。

小学生要学习996个教育汉字。2009年1月又颁布“新常用汉字表”增加了191个字，这种规定可以看成是寺子屋以来做法的延伸。韩国1987年规定小学学习谚文，中学要学习1600个基本汉字，中国的3500个常用汉字的确立则比较晚。

（3）职业化功能化汉字教学

中日两国经济发展轨迹不同。航海贸易增加时代，长崎口岸担任汉日翻译的官员被称作唐通事，他们多是旅居日本的中国人，为了把职位世袭给出生在日本的子弟，他们强调汉语的声调必须在孩子四五岁时就开始学习，这种唐通事的汉语教学从语音入手，采取“字话”训练口语，编写了系列汉语教材：以字组词，例如“天-好天-今天好天”，从“二字话”“三字话”到“长短句”和简单会话；以字类语，成组、成批地扩充汉语词汇量，例如“马头、牛头、羊头”，“马尾、牛尾、羊尾”。最后通过“常言”“小曲”小说等，辅助成段成篇的民俗、文化教学。唐通事汉语教学有了鲜明的交际功能，教材选词用语有明显的职业化特征，跟今天专门用途的外语教学高度一致。⑬

2．利用汉字造新词阐释多彩文化

兰学时代（1716到1736年间），日本使用汉字记录来自西洋（荷兰等国）的概念术语。喻冰峰《“兰学”在日本出现的原因探析》一文⑭注意到，比较中国来说，日本的地理位置使得日本更早开始学习西方文化，更加敏感、更容易接受实用的新技术，渐渐地形成了认真钻研外来文化的严谨风气。处于东西文化比较之中，日本容易对人类共性、对文化的普世性问题有更加全面的认识。沈国威（2010）⑮《西方新概念的容受与造新字为译词——以日本兰学家与来华传教士为例》说，“现在，即使在那些不再使用汉字国家的‘国语’里，大量的汉音词也依然占据着书面语言的主要部分”。例如“entertainment”在日语、韩语中是“演艺”，汉语是“表演”，“pessimists”日语是“厌世主义”，汉语和韩语中是“悲观主义”。

除了翻译，日本对汉语和汉字还有不少“改造”，例如创制日式汉字“働”，以汉字语素作为“词根”，加语缀创制日式汉语词，例如“准（新

---

⑬ 刘海燕，《〈唐话纂要〉的汉语观和汉语教学观透视》，汉学研究(总第三十二集)(2022年春夏卷)学苑出版社2022年11月，586页。

⑭ 喻冰峰，〈“兰学”在日本出现的原因探析〉，《日本问题研究》(2003年第3期)。

⑮ 沈国威，〈西方新概念的容受与造新字为译词——以日本兰学家与来华传教士为例〉，《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0年1月)。

娘）”“（发行）中”等，或者干脆创制和制汉语词，如“大切”“行事”等。有些改造是“滑稽”“纷乱”的，是特殊形态的混杂语，也可以看作是解决言文不一问题的探求和努力，有些日本汉字词反输入汉语，对中国文字学研究、汉字发展和走向问题的研究有独特参考价值。

3．协力解决汉字的信息处理和汉语数字化教学问题

1978日本工业标准协会公布了6355字的汉字编码标准。1990年开始了国际合作研发Unicode码，较早参与“万国码”的相关研发工作。现在人名地名、冷僻字的输入都得到解决，从事文史工作、古籍整理的人员借助中日韩国际标准超大字符集，可以同台显示中日韩七万多汉字。2006年2月在韩国举行东北亚名人会首次会议，这一组织2013年7月选定完成了《中日韩共同常用八百汉字表》，2015年11月30日该组织的第十次会议在韩国首尔举行，发布《中日韩共用常见808汉字表》。

日本多文化杂糅的语言文字中，汉字一直坚韧地保留着。回顾中日语言文化交流历史，我们相信在科学技术不断发展的未来，汉字也将继续发挥多文化的文字符号的价值。汉字具有多文化“共创，共有，共享”价值，汉语的组合规律和教学规律应该建立自有的“中国学派”，中日语言文化交流的研究素材从汉字出发，或许从概念定义、理论假设，再到知识论和认知论，可以走出一条自主创新之路。